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4.04.009

20世纪法国学者敦煌文献研究述评

孙传月^a, 陈明^b

(鲁东大学 a. 图书馆; b. 艺术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39)

摘要:法国的敦煌学研究一直处于欧洲领先地位,在佛教、俗文化、史地考证、民族文字、石窟考古、绘画艺术等方面的研究为世界各国学者瞩目。通过对20世纪法国学者在敦煌文献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回顾,并分类概述,可以展现法国敦煌文献研究的发展水平与成就,促进中外敦煌学学术交流,推动敦煌学研究的更大发展。

关键词:敦煌文献;法国;述评;20世纪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4)04-0056-07

自1900年发现的敦煌文献对于研究我国历史、宗教、社会、地理、民族、语言文字、文学和天文、历法、医学等学科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自1908年以来,法国敦煌文献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以20世纪法国学者对敦煌文献研究的历史为经,从敦煌文献的刊布、编目、分类研究等方面做了系统的梳理。不当之处,仰祈方家赐教。

一、敦煌文献的刊布和编目

1908年,伯希和(Paul Pelliot)自敦煌考察回国后,便开始了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编目工作,直到1920年,编制所获部分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由罗福苾^①和陆翔^②以汉文形式刊布。1952年,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开始对法藏敦煌文献展开全面的目录编撰工作。根据伯希和与王重民的笔记,谢和耐(Jacques Gernet)和吴其昱(Wu Chi-yu)完成《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一卷(第2001—2500号),1970年由巴黎国立图书馆出版。第二卷(第2501—3000号)由隋丽玫(Marie-Rose Seguy)及助手左景泉编制,于20世纪80年代完成,目前仍然没有出版^[1]。在苏远鸣(Michel Soyumié)的领导下,第三卷(第3001—3500号)、第四卷(第

3501—4000号)、第五卷(第4001—6040号)分别于1983年、1991年和1995年在巴黎出版。王微(Françoise Wang-Toutain)将伯希和藏文写本的零散汉文写卷编制成第六卷,于2001年在巴黎出版。

敦煌藏文文献的编目,主要由拉露(Marcelle Lalou)和麦克唐纳(Ariane Macdonald)等完成。20世纪30—60年代,拉露对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藏文文献进行整理编目,形成了《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共三卷,第一卷(第1—849号)、第二卷(第850—1282号)、第三卷(第1283—2216号)分别于1939年、1950年、1961年出版。麦克唐纳和今枝由郎(Yoshiro Imaeda)合编《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藏文书选刊》共四卷,分别于1978年、1979年、1990年、2001年出版。这是首次对敦煌藏文文献进行大规模的影印出版,其中部分卷子是从英藏中补充的。

敦煌吐蕃文献,巴考(Jacques Bacot)、托马斯(F. W. Thomas)、杜散(Ch. Toussaint)《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保尔古特纳出版社,巴黎,1940年)比较全面地汇集了敦煌文书中有关吐蕃历史的卷子,为古代吐蕃史、吐蕃政治制度及其与周边

收稿日期:2024-03-0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法国敦煌学研究史料汇集与整理研究”(20YJC77002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敦煌藏经洞绘画品编目及排年研究”(19YJA760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专项“敦煌藏经洞绘画品叙录”(20VJXG034)

作者简介:孙传月(1982—),女,山东烟台人,文学硕士,鲁东大学图书馆馆员;陈明(1964—),男,甘肃兰州人,史学博士,鲁东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①参见罗福苾《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书目》(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四期,1923年;第三卷第四期,1932年)。

②参见陆翔《巴黎图书馆敦煌写本书目》(《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七卷第六期,1933年;第八卷第一期,1934年)。

各民族的关系等研究提供资料。

敦煌回鹘文献,哈密屯(James Hamilton)《九至十世纪敦煌回鹘文献汇编》(皮特斯出版社,鲁汶,1986年)收录英、法藏敦煌回鹘文写本中的36种,对这些写本分别描述、音译、转写、翻译、评注,并进行词汇汇编,这是研究敦煌回鹘文书的重要资料。

此外,20世纪70年代,法国国家图书馆将所藏敦煌文献制成微缩胶卷供研究者使用,但由于受当时拍摄技术的影响,原卷有些朱笔校正点记拍摄模糊,有的文字无法清楚释读,给研究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1985年,中国台湾学者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140册)出版,其中法藏敦煌文献部分根据缩微胶卷影印。但图书所用缩微胶卷受当时拍摄技术和制作条件限制,图版难免存在误差、缺漏及模糊难以释读等问题。1994年成立的国际敦煌项目网站(IDP)陆续刊布过一些法藏敦煌文献,是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1995年由荣新江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法国图书馆开始合作编著《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对原缩微胶卷中不清晰的文献全部重新拍摄。该巨著2023年开始出版,全部出完预计160多卷,将全面反映法藏敦煌文献全貌。

二、敦煌文献综合研究

随着敦煌文献的刊布,法国学界对敦煌文献产生了极大兴趣,对历史、宗教、经济文献等研究突出,这与法国的学术传统密不可分。

伯希和凭借深厚的汉学功底,对历史文献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的《〈元朝秘史〉的蒙文名称》(TP,第14卷,1913年)通过考证《元朝秘史》的不同版本,确定了《元朝秘史》的蒙文名称。在《阔阔·迭卜帖儿与户口青册》(TP,第27卷,1930年)中,伯希和对《元朝秘史》户口青册进行了考证研究,户口青册可追溯到成吉思汗时代,蒙古语作阔阔·迭卜帖儿,记录了元朝人口的分布。《秘史蒙古原文中的两处脱漏》(保尔古特纳出版社,巴黎,1940—1941年)指出《蒙古黄金史》所填补的汉字记音转写的《元朝秘史》中有关察刺孩领忽的后代、别勒古台的母亲、把儿坛·把阿秃儿的儿子等多处脱漏。

伯希和之后,以马伯乐(Henri Maspero)、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苏远鸣、谢和耐等为代表的法国汉学家对敦煌文献作了深入研究。马伯乐的

《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的汉文文献》(大英博物馆,伦敦,1953年)对中亚发现的写本进行了整理、翻译、分类。马伯乐《拉·瓦雷·普散: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收集的梵文文书——〈杂阿含经〉残卷》(BEFEO,第13卷,1913年)将普散刊布的《杂阿含经》梵文残卷与巴利文本和汉译本进行了对比研究。马伯乐对《伯希和:〈金光明经〉东伊朗文残卷》(BEFEO,第13卷,1913年)进行了评介,肯定伯希和对东伊朗文《金光明经》残卷的研究成果,指出伯希和研究的一处讹误,Binzuru实际是宾头卢罗汉。马伯乐还对《柯诺:中国突厥斯坦古代雅利安语佛教著作残卷》(BEFEO,第16卷,1916年)进行了评介,指出中国突厥斯坦古代雅利安语佛教著作残卷中的罗汉与玄奘译《大阿罗汉难提蜜多罗所说法住记》中的罗汉不同,这应该是于阗文献抄写者的失误,发现漏掉了苏步陀。

20世纪80年代起,戴仁(Jean-Pierre Drège)的敦煌写本研究成果可观。《敦煌和吐鲁番写本的断代研究》(BEFEO,第74卷,1985年)^{[2]522-547}研究了敦煌写本形态分析、“伪”的问题、写本复用等。《台北藏敦煌写本研究:断代和真伪》(BEFEO,第74卷,1985年)研究了台北藏敦煌汉语写本形态特征、真伪问题。《有关敦煌遗书的“新”藏品》(CEA,第3卷,1987年)整理研究了北京国家博物馆遗书增补,甘肃省博物馆、敦煌研究院以及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藏敦煌遗书。戴仁在《高等研究院年鉴》发表有关敦煌写本的报告《中国历史和文明》(AEPHE,第11册,1997年),研究了敦煌发现的印本图像的问题;《中国历史和文明》(AEPHE,第14册,2000年)研究了莫高窟第17窟发现的有关敦煌历史和地理的写本。

此外,梅弘理(Paul Magnin)在《中国佛教论著:大乘诸法二边义》(EOEO,第6期,1985年)中阐释了《大乘诸法二边义》的要义;《敦煌的宗教活动和断代写本》(CEA,第3卷,1987年)^{[2]562-576}运用对应历史事件的方法,追查写本断代的线索。石内德(Richard Schneider)《敦煌本〈普化大师五台山巡礼记〉初探》(CEA,第3期,1987年)^{[2]120-136}研究了敦煌本P.3931关于印度普化大师前往五台山巡礼过程,对写本进行了断代、译注。鄂法兰(Françoise Aubin)《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文写本和印本书籍简明目录(伯希和遗作,高田时雄校编)》(BEFEO,第86卷,1998年)叙

述了梵蒂冈馆藏汉文文献,指出高田时雄校本的错误;鄂法兰在《伯希和〈西安府景教碑译注〉(富安敦增补)》(ASSR,第106期,1999年)一文中指出富安敦围绕伯希和的研究做的边注,重构基督教在中亚和东亚起源的历史,注释标明了伯希和的补充修正。

法国高等研究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每年编撰年鉴报告,记录教研与研究成果情况。以苏远鸣、梅弘理、戴密微、让·布尔兹斯鲁斯基(Jean Przyluski)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在《高等研究院年鉴》(AEPHE)上发表了有关敦煌文献研究的报告。苏远鸣《中国历史和文献学》(AEPHE,第1968期,1968年)围绕血盆和罪业、宝卷做了相关研究;《中国历史和文献学》(AEPHE,第1969期,1969年)研究了《十王经》经文和宝卷。苏远鸣《中古时代和现代中国的历史和文献学》(AEPHE,第2册,1985年)在1981—1982年报告中,研究了敦煌莫高窟几个石窟的瑞像碑文、莫高窟内壁画;在1982—1983年报告中,研究了敦煌壁画铭文,补充和修正了孙修身的研究成果,研究中国的阿育王塔和莫高窟图像。苏远鸣、梅弘理《中古时代和现代中国的历史和文献学》(AEPHE,第3册,1987年)在1983—1984年报告中,研究了敦煌写本中的各种祷告、9—10世纪敦煌显贵头衔、敦煌洞窟内的一些雕塑;在1984—1985年报告中,研究了敦煌卷轴画、写本中的画、佛教图像等。

三、敦煌非汉文文献研究

巴考《藏文非正统佛经著作的标题和题记》(BEFEO,第44卷,1951年)参照《甘珠尔》《丹珠尔》等正统佛经,指出藏文非正统佛教著作题记的翻译错误,这对翻译史和佛教文学传播都具有意义。巴尔比(Jagbans Kishore Balbir)《藏文喇嘛故事》(AEPHE,第1962期,1962年)对敦煌藏文写本P. T. 981《罗摩衍那》作了译述,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情节比对。安妮·玛丽·布隆多(Anne-Marie Blondeau)《敦煌吐蕃写本中的马经和医马经研究资料》(AEPHE,第1966期,1966年)研究了关于马经和医马经的敦煌吐蕃藏文写本P. T. 1061—1066,并与《丹珠尔》中的记述作比较,这是利用敦煌藏文写本研究古代西藏兽医技术的第一本专著。今枝由郎《伯希和藏文1291号文书的考证:〈战国策〉的藏文译本》(匈牙利东方

学报,第34卷,1980年)考证P. T. 1291是《战国策》,中国学者马明达、沈琛考证为《春秋后语》。今枝由郎《〈生死轮回史〉,一部敦煌藏文写本研究》(德罗兹图书馆,日内瓦、巴黎,1981年)研究了敦煌藏文文献《生死轮回史》,认为其与《回向》和《通向天界之路》为三部曲,今枝由郎认为《生死轮回史》是伪经。谢萧(Cristina Scherrer-Schaub)《龙树的〈缘起心论颂〉藏文写本》(CEA,第3卷,1987年)研究敦煌本P. T. 769,与北敦N5236,5467进行比对,发现三者之间差异极小,更多地归于抄写人的错误。谢萧《为弃教者祈祷——吐蕃历史残卷研究》(CEA,第11卷,1999年)研究了敦煌藏文写本P. T. 134《赞普天子乌东丹功德回向祈愿文》,分析愿文中使用的4种不同的格式化语句,推断乌东赞是史书记载的朗达玛。皮诺(Georges-Jean Pinault)《中亚吐火罗写本和佛教文学》(CRAI,第135—1期,1991年)结合龟兹人的年号纪年和生肖纪年法,对库车地区石窟内涂鸦进行断代,整理吐火罗写本,对已刊布的吐火罗B写本逐字索引,指出吐火罗语使用的格律与梵文韵律不同,吐火罗写本中的诗开头的用语与敦煌变文的传统用语对应。

四、敦煌宗教文献研究

宗教写卷研究方面,法国学者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在摩尼教研究方面,在沙畹(Edouard Chavannes)《一份10世纪的中国摩尼教文献》中(CRAI,第55—8期,1911年),沙畹和伯希和一起刊布翻译了在千佛洞内发现的摩尼教论著残卷。沙畹、伯希和《摩尼教流行中国考》^[31](JA,第18卷,1911年;JA,第20卷,1913年)刊布了摩尼教残卷和法文翻译,并做了许多考证,勾勒了中国摩尼教的发展概况,为研究摩尼教在中国传播史研究奠定基础。

伯希和《牟子理惑》(TP,第19卷,1920年)对《牟子理惑》进行了翻译和注释,伯希和认为牟子生活于公元2世纪后期,《太子瑞应本起经》抄袭了《牟子理惑》的内容。鄂卢梭(Léonard Aurousseau)《伯希和:牟子理惑》(BEFEO,第22卷,1922年)在伯希和研究的基础上,对《牟子理惑》的真伪和成书时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高梯奥(Robert Gauthiot)、伯希和、本维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善恶因果经》(保尔古特纳出版社,巴黎)分别于1920年、1926年、1928年合作校译

了粟特、汉、藏三语本《佛说善恶因果经》，指出粟特、汉、藏三语本内容的不同。戴密微《劳依曼：弥勒会见记剧本》(BEFEO, 第 20 卷, 1920 年)对劳依曼的研究进行评介,指出一些佛教徒仅在模仿婆罗门教禁欲主义者时才会戒肉,而此戒律没有得到普遍推广;《〈弥兰陀王问经〉汉译本》(BEFEO, 第 24 卷, 1924 年)介绍了《那先比丘经》现存版本及汉译本历代收录情况,将汉译本和巴利文本进行比较。

“二战”后,以戴密微、谢和耐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在佛教文献研究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戴密微研究禅宗文献多年,发表了《惠能及其坛经》^①、《有关中国禅宗的两卷敦煌文书》,后者收入《纪念塚本善隆教授佛学论文集》(京都,1961 年),利用 P. 4646 及 S. 2672 两件敦煌汉文写卷讨论吐蕃僧净问题。谢和耐首开佛教语录研究之河,发表了《荷泽神会禅师语录(668—760)》(BEFEO, 第 31 卷, 1949 年)、《洺山灵佑大师语录(771—853)》(BEFEO, 第 45 卷, 1951 年)、《荷泽神会禅师语录补考》(BEFEO, 第 44 卷, 1951 年)。其中,《荷泽神会禅师语录补考》根据铃木贞太郎与公田连太郎校订的《敦煌出土荷泽神会禅师语录》以及敦煌写本 P. 2045《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补充了对神会禅师的研究。谢和耐评述了《吴其昱:本际经》(RHR, 第 163 卷, 1963 年),吴其昱借助 7 世纪末到 8 世纪初的 81 卷敦煌写本修复了几乎整个著作。戴仁《大随求陀罗尼的早期印本》(CEA, 第 11 卷, 1999 年)对比敦煌《大随求陀罗尼》印本和中国多地发现的陀罗尼印本,推定印本年代,对比图像和纸张等。梅弘理《伯希和 3183 号天台宗智者大师发愿文——受净土思想影响的一件抄本》(CET, 日内瓦, 1979 年)、郭丽英《敦煌本〈东都发愿文〉考略》^[2]₁₀₅₋₁₁₉(辛格-波利尼亚克基金会, 巴黎, 1984 年)通过对东都发愿文题跋及内容整理,探讨梁武帝当时举行宗教活动的情形。

隋丽玫在 1984—1985 年报告中,比较《法门名义集》的许多段落与写本 P. 3357 相同,但是 P. 3357 似乎没有借用《法门名义集》,整理相关的敦煌写本清单,题为“佛教教理一例”。苏远鸣、梅弘理《中古时代和现代中国的历史和文献学》(AEPHE, 第 5 册, 1994 年)苏远鸣研究 6 世纪中叶的古代写本以及 7—8 世纪的文字,梅弘理基于敦煌写本研究 5—10 世纪中国佛教与政权的

关系,还研究了写本 P. 2547 和 P. 2940。布尔兹斯鲁斯基、戴密微《佛教文献学》(AEPHE, 第 1946 期, 1946 年)研究了无著的《瑜伽师地论》和慧能的《六祖坛经》;戴密微《佛教文献学》(AEPHE, 1948—1949 期, 1949 年)研究了世友的《异部宗轮论》和《神会语录》。

道教文献是法国敦煌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吴其昱的《敦煌发现七世纪道教佚经〈本际经〉写本》(CNRS, 巴黎, 1960 年)借助 7 世纪末至 8 世纪初的 81 卷写本修复了几乎整个著作,开启了道教经文整理出版的开端。康德谟(Max Kaltenmark)《〈本际经〉神仙名称考释》(CET, 日内瓦、巴黎, 1979 年)通过研究《本际经》中的神仙名称,阐释了《本际经》的神学思想。索安(Anna Seidel)《太上灵宝老子化胡妙经考》(CET, 第 3 卷, BEFEO, 1984 年)研究写本 S. 2081,对道教神话和末世论产生极大兴趣,比对《书经》,将写本中的国名、君王等做了一览表。穆瑞明(Christine Mollier)《一部道教启示录——〈洞渊神咒经〉研究》(AEPHE, 第 96 卷, 1987 年)研究了《洞渊神咒经》历史、宗教仪式等,分析其神学思想和启示录主题。劳格文(John Lagerwey)的《早期的道教启示录》(CEA, 第 6 卷, 1991 年)对穆瑞明关于《太上洞渊神咒经》的研究作了述评,指出“三洞”这一术语确实出现在《神咒经》敦煌本中,还研究了佛教对神咒经的影响。劳格文在《〈无上密要〉:六世纪的道教经典》(BEFEO, 巴黎, 1980 年)中对 6 世纪道教类书《无上密要》进行了整理、注释、翻译,讨论其反映的思想、教义与制度问题。法国学者在道教文献的考释研究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五、敦煌民族文献研究

法国学者对古代西藏研究历史悠久,成果显著。拉露师从巴考,是法国一代藏学名师,《高地亚洲宗教信仰中通向幽冥之路》(RHR, 第 135 卷, 1949 年)研究了敦煌藏文写本《亡者道示》,推定其成书时间,阐释了“死者审判”和“因果报应”两个概念,该写本体现了在众多宗教盛行下救世信仰的巨大发展。拉露在《高等研究院年鉴:西

^①《高等研究院年鉴:历史和哲学科学》,1944—1945 年,第 138—139 页;1945—1946 年,第 139 页;1946—1947 年,第 171—172 页;1947—1948 年,第 60—61 页。

藏研究》发表了多篇简报,介绍学者对敦煌行政文书、苯教写本、蛇崇拜的治疗师的仪式、占卜文书等方面的研究。此外,拉露的《七至九世纪的中原与吐蕃》(JS,第4期,1965年)比对7—9世纪的汉藏历史文献,指出《吐蕃古代史》索引中列出了123个吐蕃贵族名转写。

路易·巴赞(Louis Bazin)是法国著名突厥学家,他在《高等研究院年鉴》发表了有关古突厥研究的报告。《突厥历史和文献学》(AEPHE,第1960期,1960年)研究了古突厥历法、编年和占星术以及回鹘时期突厥散文史,涉及汉—回鹘使臣往来的敦煌文书和鄂尔浑碑铭文;《突厥历史和文献学》(AEPHE,第1963期,1963年)研究了《先祖阔尔库特书》《撒鲁尔卡赞大帐被劫》的故事、敦煌回鹘文和库车写本。巴赞研究古突厥碑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8至11世纪中亚的古突厥碑文:成果与展望》(CRAI,第133—3期,1989年)介绍了学者们围绕古突厥文取得的研究成果,为8—11世纪上叶尼塞突厥部落民族学、家族结构、生活方式、人口学等研究提供了参考;《蒙古和西伯利亚南部早期的(6—10世纪)突厥碑文研究》(AA,第45卷,1990年)研究了鄂尔浑和叶尼塞碑文等古突厥碑文等。此外,巴赞的《古突厥社会的历史纪年》^{[4]1}(载《匈牙利东方丛书》,布达佩斯,1991年)以历史语言学为出发点,研究涉及了历史学、考古学、金石学、民族古文字学、民俗学、天文学、地理学、气象学、星相学、人类学、民族学、动植物学等诸多领域。

麦克唐纳夫人师从拉露,精通藏文,熟悉西藏佛教,在《高等研究院年鉴》发表多篇《西藏历史和文献学》专题报告。《西藏历史和文献学》(AEPHE,第1970期,1970年)研究了密拉日巴生平故事及传记作者、第一位吐蕃王及其家族、《格萨尔》史诗的音乐、汉藏与缅甸语比较语言学、避难到印度的苯教群体和西藏苯教寺院分布和组织。《西藏历史和文献学》(AEPHE,第1971期,1971年)研究了敦煌占卜文书P. T. 1047,了解吐蕃王及贵族的宗教信仰的概念意义,写本中的占卜术语可能是从象雄语转写而来;还研究了说明古拉和穆曼信仰的古文献及一些宗教词汇、赤松德赞时期的两份赦令。《西藏历史和文献学》(AEPHE,第1985期,1985年)在1981—1983年的报告中,研究了煨桑仪式,把敦煌写本(P. T. 117, P. T. 239和India Office 752)与朵玛制作手

册进行对照。《西藏历史和文献学》(AEPHE,第4册,1994年)根据敦煌写本研究7—9世纪吐蕃王朝历史,评述石泰安的《祖拉与吐蕃巫教》,重新使用梵藏词典《翻译名义大集》中的“祖拉”的阐述。

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是当代法国最有权威的藏学家,发表了多篇关于吐蕃古代文献的研究。《古西藏1:敦煌写本中的印—藏与汉—藏两种辞汇》^{[5]1251-1327}(BEFEO,第72卷,1983年)研究有关禅宗的敦煌藏文写本与《翻译名义大集》完全不同的佛教词汇,对比梵、汉、藏、印词汇中的佛教词汇。《古西藏2:吐蕃王朝时代告身中对隐喻的使用》^{[5]263-276}(BEFEO,第73卷,1984年)指出吐蕃告身与一些隐喻特定美德的图像有关,研究隐喻如何被用于告身。《古西藏3:祖拉与吐蕃巫教》^{[5]527-580}(BEFEO,第74卷,1985年)指出《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的创新之处及不足,认为gcug是祖拉(gcug-lag)的缩写,当祖拉一词通过具体例子定义时,它不指宗教,而是指政治或行政机构。《古西藏4:吐蕃佛教起源的传说》^{[5]491-526}(BEFEO,第75卷,1986年)通过写本《达玛从天而降》考证了吐蕃佛教的起源。《古西藏5:敦煌写本中的吐蕃巫教与苯教》^{[5]799-844}(BEFEO,第77卷,1988年)研究了古老的宗教和苯教、敦煌写本中苯教及苯教群体、辛的不同和功能、葬礼等。《古西藏6:两卷敦煌藏文写本中的儒教格言》^{[5]277-288}(BEFEO,第79卷,1992年)研究了写本P. T. 987和P. T. 988中汉地儒教智慧格言集。石泰安与麦克唐纳对“祖拉”的辞义问题、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的断代、具体诠释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分歧,二人的这场争论引发了法国有关敦煌吐蕃文书的第4次大论战^{[5]13}。

六、敦煌经济文书研究

谢和耐的《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6]1}(法国远东学院,西贡,1956)根据敦煌及其他西域文书,分析了中国南北朝到五代时期的寺院经济,揭示宗教活动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寺院的重要性和对整个国家生活的影响。《从9—10世纪的敦煌契约看中国的商品交易》(TP,第45卷,1957年)根据敦煌写本研究中国的专卖制度,分别从有关专卖制度的刑法规定、物品和价款交换、双方的不平等、文契的作用等方面进行论述,创新之处在于引入西方法学观点。法国大学

出版社 1966 年出版的《敦煌写本中的租骆驼旅行契》^{[2]96-104} 研究了旅客为长途旅行租骆驼签下的契约,这是研究 9 世纪中亚运输史的重要资料。《敦煌写本中的一项缓税请状》^{[7]133-136} (德罗兹图书馆,日内瓦、巴黎,1979 年)利用敦煌社会文书研究了有关社会经济问题。

童丕(Eric Trombert)专攻敦煌社会经济文书,尤其是借贷契约和寺院账簿。《十世纪的敦煌借贷人》^{[7]69-132} (TP,第 80 卷,1994 年)、《敦煌的借贷——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法兰西学院,巴黎,1995 年)基于敦煌经济文书研究敦煌借贷,研究借贷类型、借贷成本等。《酒与佛教——八至十世纪敦煌寺院的酒类消费》(CEA,第 11 卷,1999 年)通过敦煌写本研究寺院酒消费规模、获取酒的方式、酒的种类、饮酒契机等,对敦煌寺院经济研究提供参考。童丕在《高等研究院年鉴》发表了《中古时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系列专题报告,《中古时代中国经济与社会》(AEPHE,第 11 册,1997 年)根据写本研究敦煌和吐鲁番日常生活的物质基础,包括人口登记册、纺织品、吐鲁番墓葬中的陪葬品,还研究了有关粟特人的吐鲁番汉文文献。《中古时代中国经济与社会》(AEPHE,第 12 册,1998 年)继续研究敦煌和吐鲁番日常生活的物质基础,包括佛教寺院籍帐、农业生产体系和耕地空间的开发,解释吐鲁番普遍存在的租佃。《中古时代中国经济和社会》(AEPHE,第 13 册,1999 年)研究了吐鲁番地区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指出粟特人在葡萄种植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古时代中国经济和社会》(AEPHE,第 14 册,2000 年)研究了沙州僧龙藏牒申诉家产纠纷文书(P. 3774)、库车历史和都勒都尔·阿护尔文书。可以说,童丕是继谢和耐之后,利用敦煌文书研究社会经济成果最为丰硕的一位后起之秀。

七、敦煌占卜文书和其他相关研究

敦煌占卜文书也是法国敦煌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戴仁探讨了占梦术,《中国梦学考》(BEFEO,第 70 卷,1981 年)基于敦煌写本中找到解梦书的起源,对比 10 世纪不同的解梦书了解解梦类型,分析不同的解梦技术;《敦煌写本中的解梦书》^{[2]312-349} (德罗兹图书馆,日内瓦、巴黎,1981 年)对解梦写本统计、分类,对 P. 3908 译注。茅甘(Carole Morgan)从事敦煌写本占卜文书研究,

《敦煌写本中的九宫图》^{[2]301-311} (CET,第 2 卷,巴黎,BEFEO,1981 年)研究了敦煌写本历书中九宫图的意义以及其表现形式的变化;《敦煌文书中的五姓堪輿法》^{[2]249-256} (CET,第 3 卷,巴黎,BEFEO,1984 年)研究了敦煌堪輿写本,对姓氏进行分类,指出五姓用途;《敦煌写本中的乌鸣占凶吉书》^{[2]367-390} (CEA,第 3 卷,1987 年)研究了敦煌写本中根据乌鸦鸣叫声进行占卜的问题。侯锦郎(Hou Ching-lang)《敦煌写本中的唐代相书》^{[2]350-366} (CET,日内瓦、巴黎,1979 年)研究了敦煌写本中的唐代相面术。

法国学者围绕印刷术和纸张展开研究,伯希和《远东印刷术之初》(CRAI,第 1 期,1928 年)追溯了中国印刷术的起源和发展,考证敦煌回鹘文活字印刷样本,指出欧洲借鉴了中国的印刷术。戴仁致力于敦煌写本纸张研究,《敦煌纪年汉文写本纸张研究》(TP,第 67 卷,1981 年)通过对有纪年的写本纸张分析,为未断代的写本提供断代依据;《敦煌的经折装写本》^{[2]577-589} (CET,第 3 卷,巴黎,BEEFO,1984 年)研究了敦煌经折装文书的断代、内容、开本、类型、装订和版面编排;《敦煌文书纸张纤维分析及其年代》(JA,第 274 卷,1986 年)对敦煌写卷进行形态学分析和微量化学分析,以便更准确地辨识贗品;《中国纸张的起源》(CRAI,第 131-4 期,1987 年)研究了汉墓麻纸残片、敦煌及罗布泊发现的纸张残片,从词源研究了“纸”一词等;《敦煌写本纸张的颜色》^{[2]590-594} (CEA,第 3 卷,1987 年)对标《新版标准土色帖》,对伯希和敦煌特藏的七卷写本作了记录和列表。通过对写本纸张分析,对文书的产生时期和纸张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苏远鸣对斋戒文书进行了研究,《敦煌写本中的地藏十斋日》^{[2]391-429} (CET,日内瓦、巴黎,1979 年)将不同时代和来源的十斋日历书进行比较研究;《敦煌写本年中十二日斋历》(BEFEO,第 69 卷,1981 年)比对 10 本有关十二日斋历的敦煌写本和现代印本,研究各写本中有关礼佛次数、除罪、劫数等问题,发现斋历中日期和时辰等的选择是随意的,拜佛不仅次数不同,且方位不同。葛乐耐(Frantz Grenet)、皮诺《根据一幅吐鲁番绘画看印度和伊朗的占星术传统》(CRAI,第 141 卷,1997 年)研究了一份纸质残卷上的彩色图像,根据图像上婆罗米文字确定位置在吐鲁番地区,分析图像上的十二星相及人物。

100多年来,法国敦煌文献研究成果显著,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内容更加深入,许多研究成果领时代之先,为敦煌学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近年来,随着中法两国学术交流的不断加强与法藏敦煌文献的全面公布,法国敦煌学研究方兴未艾,将极大地推动了敦煌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参考文献:

- [1]陈海涛.法国的敦煌学研究[J].法国研究,2002(1).
- [2]谢和耐,苏远鸣,戴仁,等.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M].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93.
- [3]沙畹,伯希和.摩尼教流行中国考[M].冯承钧,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 [4]路易·巴赞.古突厥社会的历史纪年[M].耿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
- [5]郑炳林.法国藏学精粹[M].耿昇,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

[6]谢和耐.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M].耿昇,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

[7]郑炳林.法国敦煌学精粹[M].耿昇,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

文中缩略语:

- AA:《亚洲艺术》
AEPHE:《高等研究院年鉴》
ASSR:《宗教社会科学资料库》
BEFEO:《法国远东学院学刊》
CEA:《远东亚洲丛刊》
CET:《敦煌学论文集》
CNRS: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CRAI:《金石与铭文学院学报》
EOEO:《远东远西》
JA:《亚洲学报》
JS:《学者杂志》
RHR:《宗教史评论》
TP:《通报》

Review of the Study of Dunhuang Documents of French Scholars in the 20th Century

SUN Chuanyue^a, CHEN Ming^b

(a. Library; b. School of Art,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Dunhuang Studies in France has always been in the leading position in Europe, and the research on Buddhism, popular culture, textual research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ethnic characters, grotto archaeology, and painting art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schola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By sorting out, reviewing and summarizing by classific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French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Dunhuang documents in the 20th century, it shows the development level and achievements of French Dunhuang documents studies, facilitates the academic exchange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Dunhuang Studies, and promotes the greater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f Dunhuang Studies.

Key words: Dunhuang documents; France; review; 20th century

(责任编辑 陇 右)